

跨文明對話書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考據學論稿

汪啓明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考據學論稿

江有誥 著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

跨文明對話書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考據學論稿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考據學論稿/汪啓明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4

ISBN 978-7-80752-556-1

I. ①考… II. ①汪… III. ①考據學—研究—中國
IV. ①K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35745 號

考據學論稿

汪啓明 著

責任編輯 謝藝波

封面設計 楊 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28.5

字 數 79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556-1

定 價 59.00 圓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跨文明對話書系》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朱立元 曹順慶

主 編：徐行言

副 主 編：汪啓明 傅勇林 段志洪

編審委員會委員（按音序排名）：

柏 樺	段志洪	傅勇林	高 力	李 崗
阮 航	施 維	蘇志宏	汪啓明	徐伯初
徐行言	謝藝波	易伯倫	趙 靜	

總 序

東西方文明的差異自古而然，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由來已久。然而自西方工業革命興起以來，由於西方社會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以致於在相當長的時期，不少東西方學人都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社會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視為衡量文明發展水平的標尺，把社會進步的理想目標定位於以西方發展模式為藍本的現代化，或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普世文明。所謂西風東漸，西學東移，相當一批東方學人和政客也把工業化、信息化等現代科技進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產物，為此他們不遺餘力地向西方尋求真理，甚至將揚棄本民族的傳統，從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為實現現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歸宿。東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現為單向的態勢——以先進的西方文明征服、影響和改造其他“落後”或“野蠻”的文化似乎成為人類走向現代化生活的必然趨向。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降，由於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趨便捷，發達國家產業的轉移和國際市場的開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和文化聯繫不斷增強，人員、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

式、思想觀念的流動和相互溝通日益增長，逐漸使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各種複雜關係滲透交織的網絡，全球化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然而，今天的全球化並不意味着將出現一種全球同質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隨着西方式工業文明內在矛盾的凸顯、西方知識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國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為全球化語境下許多後發區域維護民族文化傳承、保持自身文化特質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已不再是簡單地演繹強勢的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及其他弱勢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長期處在邊緣的第三世界地區的文化傳統也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參與對現代性的詮釋，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並尋求走向現代化的多元模式與道路。

儘管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乃至對抗仍難以避免，不同文化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與衝突依然存在，但和平發展、和諧相處畢竟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主旋律。因此，對話正在成為不同文明之間交往的基本立場和方式。

何謂對話？對話的實質應是不同主體間雙向互動的交流。哈貝馬斯把對話作為不同社會階層交往的主要形式，認為通過對話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為的目的。而巴赫金則將對話關係看做無所不在的現象，他認為整個人類的語言、人類生活的一切關係和一切表現形式、乃至一切蘊含着意義的事物之間都浸透着對話關係。毋庸置疑，對話的精神是交流、溝通與互動。這裏有相互的凝視、好奇與欣賞，有積極的理解、借鑒與汲取，有主動的自省、調整與改造。總之，它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學與互滲過程，文化學所總結的關於文化交往過程中的互化與涵化現象都可以說是對話的成果。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文明間對話的基礎應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視，更不是恃強凌弱的輸出與同化。

那麼，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應當怎樣呢？顯然，我們所理解的文明間的對話並非政客之間的會談，也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來自實際的接觸行為或交互關係研究所產生的主題，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間產生碰撞與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時借助於面對面的接觸，相互汲取對方的優勢，滋養自身的肌體；有時卻並無直接交往，祇是文明畫廊中不同文化間差異的自然呈現，各自在對異域風景的注視中產生心有靈犀的感悟、啓迪，乃至誤讀。此時，其中一方祇需利用某種可以達成溝通的媒介和語言，將自身的文化特徵與個性表達出來便已成為對話的主體。

基於上述理解，我們將這一套叢書定名為“跨文明對話書系”。這裏匯集了西南交通大學“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藝術與傳播學院”、“外國語學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經典成果的多視角研究，關於中外語言文學的交流與影響的個案分析以及基於現代學術立場，運用現代方法進行的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的個案研究，可謂衆彩紛呈。此中既有對過去的中西對話所產生成果的研究總結，也有在當下的語境中對他文明的審視與讀解，還有對中華文明自身文化傳承的整理與反思，其中自應包含着對新的對話的期許。相信這些學術探索對於讀者加深對全球化時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東西方文明優秀傳統的理解會有所裨益。

感謝西南交通大學出版基金的支持。讓我們將這一系列學術成果作為西南交通大學年輕的人文學科對正在走向多學科協調發

展的母校的獻禮，並借以恢復“交通”這一術語最古老也最豐富的意蘊。

徐行言記於斑竹苑

2008年6月

序

汪啟明教授以所作《考據學論稿》示余，囑為序。

全書約七十餘萬言，洋洋灑灑，於考據學之名義、內涵、方法，論述精審，舉證翔實，極富可讀性。把考據學作為一個學科體系來論述，探討它的學科屬性和基本方法，這樣的成果還不多見。

考據學是一門傳統的學問。它歷史悠久。發生於兩漢，發展於唐宋，至清朝而達到頂峰。它考校文字，詮釋名物典章制度，從而有助於前代文獻之閱讀、器物之鑑識，以期瞭解古代社會生活、思想文化，是治文史學科不可或缺的手段。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欲瞭解古人之生活，通古人之心志，必自文字始。透過文字，瞭解它記錄的語言，也就是讀懂古書，是傳統考據學的重要方法。“考文自知音始”，啟明從傳統的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諸方面入手，闡述了考據學的學術思想和方法，把考據學的理論和實踐植根於堅實的基礎上，時有新的見解。

考據學必需建立在文獻學的基礎上。它和文獻學有不可分割

的聯繫。古書的版本考論，文字的校勘，古籍的輯佚，此外的目錄學、辨偽學的綜合運用，使傳統的考據學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新的科技方法的採用更給考據學拓展了發展的園地。

“二重證據法”是現代考據學上使用得最多的方法。一般認為這種方法創始於上世紀的海寧王國維。啟明根據大量的文獻資料，力排眾議，認為“二重證據法”不始於王國維。並舉出不少王氏以前學人使用“二重證據法”的事實，極有說服力。

科學的發展，學科的分化，學科的相互滲透，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考據學的發生和發展，它和不同學科的聯繫，確定了它的跨學科性。啟明認為考據學本身是一門學科，它與研究對象的結合都是跨學科的。這既說明了考據學的定位，同時又進一步說明了今天這門學科的特性。

“東夷非夷證詰”、“蜀人與蜀語”、“蜀語、漢語、羌語同源證”、“蜀茶、蜀語、茶茶末議”、“辭書編纂考據論”、“開拓比較宗教學的新領域”、“《周易參同契》作者新證”——一批專題是近幾年考據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的考據實踐。從這些論文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進行考據的。

啟明勤學深思，筆頭甚健，時有新著問世。這是他近年教學、科研成果的總結。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出版更多的作品。

是為序。

趙振鐸時年八十有一

自序

宋代以前，凡學術皆考據，無考據不成“學”。考據學，學界或稱考核學、考證學、考據學，由於傳統考據學在清代乾嘉時期發展到頂峰，近代以來又多稱其為乾嘉考據學。晚清至上個世紀中葉，傳統考據學以史料考據為主，有學者又稱為歷史史料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形容：“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着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內行話。”近人稱史料學緣於西風東漸引起傳統考據在方法論上的創新，從而使文學考據學、哲學考據學等另闢蹊徑，傳統考據學的領域縮小為歷史考據的轉向所致。諸家稱名相殊，界定各異。所論考據學之範疇，或概括學問之全體，或僅指學問之一端，大到無所不包，小到僅為名物典制之考辨，論者紛紛，莫衷一是。因此，從理論上系統研究考據學，爬梳歧說，建立客觀、實事求是的考據學學術理論體系，進而建立中國考據學史，方可為建立系統、科學而完備的中國學術發展史奠定基礎。

無論從高校現行的教學體系、課程設置，還是學位授予方向、學科分類代碼，考據學都沒有應有的位置。近代學者談考據者不少，但將考據作為一門學科研究者並不多見。重要的理論研究成果有榮孟源、來新夏、陳剩勇、毛曦諸先生之作。龐天祐《考據學研究》、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郭康松《清代考據學研究》則是世紀之交不多見的力作。這些成果，從不同的方面對考據學進行了論述，肯定了考據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總結了考據學的研究方法。但以考據為史學考據，這樣的限定又削弱了考據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我們所謂的考據學，實指對中國幾千年來浩如煙海的古籍進行整理、辨別、求真、求正的理論與實踐。文獻“求真”離不開語言文字學的音韻、訓詁、文字和文獻學的注釋、箋證、校勘、辨偽、輯佚、目錄等手段。語言文字學、文獻學二者與考據學關係最為緊密，這是因為它們的諸分支學科與考據學學理密合，其本質是多學科的比較研究。無論是考史、考人、考地、考文、考事，都需要綜合調動不同的學科手段，指向同一個考據物件。從歷代學術實踐看，語言文字學、文獻學的成果亦為中國傳統考據學的重要成果，歷代的語言文字學家、文獻學家，也多是考據學家，反之亦然。從研究對象上看，考據學、語言文字學、文獻學三者具有同一性，那便是傳統的文、史、哲等文獻。從方法上看，考據學與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等語言文字學方法和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文獻學方法三者也是相互為用的。且不僅互為工具或方法，又互為成果。因而，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孤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語言文字學和文獻學的研究，是考據學學術理論的先期研究，可以為考據

學，進而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提供資糧。因此，我們的考據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語言文字學、文獻學這兩塊基石上的。從方法論意義上說，考據學、語言文字學、文獻學又三位一體，構成了中國學術發展史的主流。

考據是一切學問的基礎。就大的範圍來說，凡涉及古典文獻，文、史、哲、政、經、法、醫、工、農、書諸學，無不需要考據。無考據則學不立，無考據則文獻不安，無考據則事理無據，無考據則文章不實。今日所分學科起於晚近，其間原本界限模糊。大而言之，古人謂文、史、哲不分，實指研究中以考據為各門學問內核。例以今日的學科，則考據學的本質特點是多學科參較。無論古今，非如此則學問眼界狹窄，其成果或不名，或不立。新考據學，如後人的三重證據、四重證據等的研究，尋繹其學術淵源所自，亦以古人為其淵藪。

考據學的理論與實踐呈現出動態性，其發展則有階段性。“考據”作為一種綿延中國近三千年的傳統學術思想與方法，其大要：（1）萌芽於春秋戰國；（2）發展於兩漢，學者廣泛採用；（3）成“學”於魏晉南北朝，總結了學術理論體系，考據學正式建立；（4）轉型於兩宋，充實了考據的內容與方法；（5）明代為清代考據學的高山仰止奠定了基礎；（5）清代，乾嘉考據學集其大成，考據從專為經學服務擴展到史學、文學等領域；（6）新考據學萌芽於兩宋，成“學”於清末民初，轉型於上世紀末。

我們持魏晉南北朝時期始有考據學的觀點。這是因為一門學科建立，必然有其標誌。這個標誌一般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必須有確定的研究對象與範圍；必須有學科的代表人物和專門的學術著作；有規範化、系統化的研究方法。兩漢時期，考據大興，

班書設《藝文志》，目錄之中首先注意闕疑、辨偽；向、歆父子校中秘，校勘肇始；王充疑古，辨偽首現端倪；許、鄭、馬、服、賈的文字、音韻、訓詁之考據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奇葩，尤其是馬融否定《尚書·泰誓》，載之史冊。魏晉南北朝時代，不僅考據大量興起，於字句的考證、名物的疏解卓有成效，而且有系統的理論，有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大量的成就，甚至包括後世廣泛稱道的“二重證據法”亦開始萌芽，是考據學產生的時代。唐代繼承了漢人注疏的傳統，對群經進行了系統的考據和解釋，於史實與典章制度作了條辨，同時開拓了辨偽學的新領域，進一步發展了考據學。宋代是考據學的轉型時期，其特色在長於義理，又有辨偽的理論產生，但說文獻肆意發揮，是其一弊。元明清時代，主要是清代的漢學考據承繼漢儒的章句之學，並將考據學範圍擴大到經學、史學、文學，考據成為有清一代學者的主要治學方法和工具，其方法也從文字訓詁擴展到天文、地理、金石、名物、典章，其特色於校勘、輯佚、辨偽、疏解，並因為一大批重要的學者和重要的考據學成就，使清代成為傳統考據學的頂峰。

考據學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之學。考據學在兩千年中演變的大勢是從為經學服務到為史學服務，再到為文學乃至於幾乎所有的傳統學科服務。當今社會，新思想、新方法層出不窮，但傳統考據學仍有其頑強的生命力。它至少可以應用於文史研究、辭書編纂、古籍整理三大領域。樸學大師和思想家戴震以“義理、文章、考核”為學，他說：“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又說，“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

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曾國藩以“義理、考據、辭章、經濟”為學，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中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這是將三者視為不同的學術門類。他還對其弟說：“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考據學是歷代學問的基礎，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對其進行研究，實為中國學術發展史的研究。既是總結，也可為今天學術思想與方法的提供借鑒。

這部書中提出一些觀點，還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例如目錄學可資考據，但目錄學著作本身亦當考據。目錄學著作“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歷代學者多認為歷代目錄學有四分七分兩條主線。我們提出，漢劉歆、劉宋王儉、梁阮孝緒的目錄雖都以“七”為名，而實非七分。四分法纔是中國目錄學的主線。既然“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則“版本之學，為考據之先河”，當無疑義；在考據學方法“辨偽”一節中，系統地總結了中國辨偽學史；又如提出“二重證據法”不始於王國維。我們梳理了關於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認為祇是以甲骨文為代表的五大發現後，王國維纔成為當時條件下“二重證據法”的代表之一，等等。書中後半部分是筆者以考據學、語言文字學、文獻學三者貫通方法進行研究的實踐成果，其目的在於說明任何學問都需要進行多學科的研究，纔可能有所得，結論可靠。

這部書原名《文獻·考據·比較》，現在的書名《考據學論

稿》是業師趙振鐸先生和西南交大藝術與傳播學院院長徐行言先生提出的，這個書名準確地反映了這部書的實際內容；書稿草就，又獲得四川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立項項目，並得到學院的資金支持，謹至謝忱。為了知識體系的完整，撰寫過程中涉及一些知識性內容，借鑒了已有的工具書和前修時賢的研究成果，在此一並致謝。

林林總總，草成此篇，有待方家。

汪啟明於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